

论丁日昌在近代首批幼童留学中的历史作用

高如民

(河南大学 统战部,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 在洋务运动不断深入的情况下, 丁日昌热心于对外派遣留学生, 并积极参与留学一事的酝酿,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精心谋划。没有丁日昌的理解、支持和促成, 容闳的“留学教育计划”不可能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采纳, 更不可能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可以说, 留学这一惊世之举在1872年最终成行, 丁日昌的贡献功不可没。

关键词: 丁日昌; 洋务运动; 留学

中图分类号: K25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42(2006)04-0041-04

学术界对丁日昌的研究, 据初步统计, 自1980年以来有50篇左右的论文公开发表, 涉及吏治、经济、洋务、外交、社会关系等诸方面内容, 在文化教育领域的近代首批幼童留学的研究方面, 学界多把目光集中在容闳、曾国藩、李鸿章等的研究上, 而对此事同样有较大贡献的丁日昌的详论较少。在晚清洋务派中, 丁日昌可以说是一位“能见其大”、“能致其精”、“能尽其实”的重要历史人物, 在洋务理论尤其是在洋务实践方面表现出的超前意识, 在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和态度以及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选择问题上, 他均走在同时代一般人的前列。本文试就丁日昌在近代中国首批幼童留学中的贡献作一探讨, 以期对此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鸦片战争爆发后, 以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丁日昌为代表的洋务派也疾呼兴办教育、研习西学, 并以抨击科举制为突破口, 对传统的封建教育发起猛烈的冲击。一系列新型学校(如语言学校、军事学校、师范学校等)的创办, 体现了他们兴办学堂培养人才以实现自强的思想, 而在研习西学、探求富强的过程中, 最能收速效而济急用的则为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对留学教育同样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认为“出洋一年, 胜于读西书五年”, “入外国学堂一年, 胜于中国学堂三年”。^{[1] (P116)} 由此可见, 出洋留学在改革传统教育、培养人才等方

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曾国藩、李鸿章在论证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时指出: “当此风气既开, 似宜亟选聪颖子弟, 携往外国肄业, 实力讲求”, “远适肄业, 集思广益, 所以收远大之效也”。“古人谓学齐语者, 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 又曰百闻不如一见, 此物此志也”。^{[2] (P153-154)} 表达了走出国门、实施留学教育、求新知于世界的大胆想法。在当时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的背景下, 这种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主动接受并吸收西方文化知识的新式人才的培养方式, 关系到晚清统治及民族命运。从一定程度上讲, 出洋学习是全面的、切实有效的研习西学的最佳途径, 派遣留学生也就必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向国外派遣留学生首倡于容闳。容闳(1828—1912年), 字达萌, 号纯甫, 广东香山, 1847年随美国传教士布朗赴美留学, 在耶鲁大学接受过美国系统的高等教育, 1854年学成归国, 是中国近代留学第一人。容闳对西方资产阶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感受极深, 这也使他立下了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志向。“予既远涉重洋, 身受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 亦享此同等之利益。”^{[3] (P62)} 同时, 长期的西方文化的耳闻目睹, 使他产生了大量输入西方文化可以帮助古老的中国在变局中复兴之认识: “以西方文明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3] (P62)} 基于这一认识, 他也就产生了由政府派遣留学生的想法, 后又形成了具体计划。主

收稿日期: 2006-02-10

作者简介: 高如民(1963—), 男, 河南开封人, 河南大学统战部副教授。

要内容包括选派颖秀青年;先定120名学生以试行,分四批按年递派;留学限定为15年,学生年龄以12岁至14岁为主;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各项事务。另外还涉及课程安排和留学生经费的来源等事项。他认为,挑选10余岁的幼童出洋留学,15年后学成归来,30岁上下效力于朝廷,年方力强,正堪大用。

二

在美国的近代中国留学生大楼至圣殿两侧壁厢陈列的肖像中,除曾国藩、李鸿章外,还有丁日昌。丁日昌(1823—1882年),字禹生,一作雨生,广东丰顺人,官至江苏、福建巡抚。在筹办留学的过程中,丁日昌并没有亲自上奏朝廷请准留学,也不是派遣留学生出洋学习计划的首倡者,却被列为促成留学的主要人物,可见丁日昌在清末第一批幼童出洋留学中的作用与贡献。在幼童出洋留学活动中,容闳首倡于先,曾国藩促成于后,而中间起桥梁和促进作用者则为丁日昌。

容闳对自己这项留学生计划充满信心的原因有二。第一是他认为这项计划详细周密,基本上涉及到留学过程中具体问题的方方面面。第二是在他奏请计划时主要依靠两个有实权且又热心的人物,一个是曾国藩,“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当日政界重要人物”。另一个就是丁日昌,“与余志同道合者,又有老友丁日昌。丁为人有血性,好任事,凡所措施,皆勇往不缩”。^{[3] (P121)}

在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时,容闳就到苏州公署向他和盘托出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丁日昌对此也大为赞许,并嘱容闳尽快起草一份详细材料。这个草案就是日后中国派遣赴美留学生的蓝本。其基本内容包括人数、年龄、计划批次、留学期限等,学习内容为自然科学或法律等专门知识;经费由上海海关从税收款项中提成拨给;朝廷派出留学生监督负责管理。这个说帖由丁日昌以奏稿寄呈洋务派在朝廷的主要代表人物、时任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请其具名上奏。这样,在丁日昌的积极支持下,一份开创近代中国派遣留学生风气的文件产生了。丁日昌在留学计划酝酿过程中,多方筹措极力促成的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请求文祥代奏。“文祥,满人,时方入相,权力极伟也。”^{[3] (P121)}文祥在总理大臣之中开明且有魄力,遗憾的是恰遇文祥丁忧,按照中国礼制,凡现任官员遭父母之丧者,须辞职居丧3年,不得与闻政

事。更让他们绝望的是守丧不到3月,文祥本人也因病去世。

第二,极力向曾国藩建议。文祥去世后,容闳就转而想借助清朝重臣曾国藩的支持,他请丁日昌“常向曾督言此,以免日久淡忘”。^{[3] (P123)}丁日昌受容闳之托,确实重又提及,但并未引起曾国藩的足够重视。直到1870年,在丁日昌与曾国藩一起调停天津教案时,丁日昌向曾国藩重又提及留学教育一事,才最终有了成效。据容闳回忆说:“一夕,丁抚归甚晚,予已寝,丁就予室,呼予起,谓此事已得曾公同意,将四人联衔入奏。”^{[3] (P125)}可见,丁日昌为此事出力甚多。另外,曾国藩之所以重视丁日昌之提议,情愿多次代为上奏,除了他对时局的清醒认识外,两人在长久交往中他对丁日昌的了解也是一个因素,曾国藩在统领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时,就知丁日昌之认识宏远,是一位有真知灼见及很有条理之人。

第三,游说枢府诸臣。同治八年(1869年)四、五月间,丁日昌利用进京陛见的机会多次拜见枢府诸臣,推介出洋留学计划,但此时丁日昌所谈的一些情况与容闳的计划有些出入,如留学之青年不少于200名,而非120名,并定留学之去向为美国与欧洲,而非仅留学美国。虽此计划并未上奏,但出洋留学在京师大员中也已有了议论,影响渐至扩大。

第四,扩充所习内容。派人到国外学习工艺制造一事,他早在同治四年(1865年)与李鸿章已有讨论。但当时所议只限于旗兵,学习偏重于军器。丁日昌在天津向曾国藩的建议中扩大了学习范围,“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2] (P153)}

第五,推荐负责人。丁日昌密切关注留学计划的进展,也为这一计划能早日实施而殚精竭虑,表现之一就是对学生监督的人选考虑。这一举动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记载说:“丁抚旋荐陈兰彬于予,谓将来可副予为中国留学生监督……。”^{[3] (P126)}同时,丁日昌还具体陈述了在当时环境中这样选择的原因:陈兰彬身为翰林,是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推荐陈兰彬也是为了减少留学成行过程中的阻力。

留学之事,“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2] (P157)}在筹办过程中的困难也较多,其中的选材及筹费之难尚好解决,而传统体制与保守心态的阻挠相当棘手。反对力量大,真心支持者少,传统的束缚无形中就形成了留学计划实施中的障碍。正是考虑到传统体制下守旧心态的抵制,容闳所提四则条陈中列留学于第二,本来容闳眼光所注而望其

必成者为留学一款，而置此于其他陪衬之条款中，当有避嫌之意。按容闳的解释：“予友谓予，官厅批誉公事，例有准驳，吾与以可驳者，而欲得者乃批准矣，且目的所在，列之事二，乃不显有偏重之意也。”^{[3] (P123)} 同样，丁日昌举荐有翰林资格时任刑部主事之陈兰彬为留学生监督，也是顾及到这层阻力。丁日昌曾对容闳说：“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于垂成，故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3] (P126)}

三

中国首批留学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八月十一日由容闳等率领，从上海乘船赴美。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件大事。丁日昌在困难较多、阻力较大的情况下，仍对留学一事倾力支持，原因有三。

第一，丁日昌与容闳有深厚的个人友谊。容闳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等学校的留学生，对西方文化了解颇深。归国后，一度成为丁日昌之智囊。他以其海外亲身经历向丁日昌介绍了西方世界的一些实际情况，对帮助丁日昌了解和认识美国等西方国家颇有裨益。容闳向丁日昌多有建言，内容涉及轮船公司、派遣留学生、开矿、筑路、教会等问题，引起了丁日昌的重视。特别是其留学教育计划尤为丁日昌赞同，竭力予以促成。因而，容闳为丁日昌坚定认知西方文化的决心和信念，提供了师友之间难得的激励作用。

第二，容闳的留学建议，正符合丁日昌以培训实用济世人才为目的，以研习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思想。丁日昌认为，在外来势力渗入中国的时势中，单纯的儒家道统是于事、于时无补的，因此，在其教育思想中也就始终偏重于西人之长技的西学。“船坚炮利，外人长技在此，中国受制亦在此。”^{[4] (P50)} 为摆脱受制于人以自强，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吸纳西学，是先进的中国人面向世界、研究现实后的冷静选择。丁日昌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内容涉及“船坚炮利”、人才培养、外交理念、富强之术（包括铁路、矿业等物质文明）等方面，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基于此，他大胆实践，从而为晚清近代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晚清思想文化演进历程中功不可没。一批守旧之士如王家璧、于凌辰等人则对丁日昌多方诋毁，大骂他“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5] (P130)} 且斥其为“丁鬼奴”，^{[5] (P121)} 甚至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还有人上奏清廷“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9] (P855-856)}

第三，时代所赋予的责任感。丁日昌对凡有益于时务者，均主张实心研究。这就决定了他热心支持走出国门、出洋学习的留学计划。作为一个开明且有远见卓识的洋务官僚，丁日昌在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履行着这一有强烈时代性和饱含民族情感的神圣使命。留学成行，不仅有利于西学的学习与传播，这一前所未有的创新之举也把救亡与启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也暗合了须图自强之历史趋势，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应紧密联系的时代要求。

因此，中国首批留学生赴美的历史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直击“夷夏大防”，突破传统技艺观。“夷夏大防”、“夷夏之辩”是中国传统的对外观念，传统技艺观一直都视技艺为奇技淫巧，这些观念无疑是通向近代化的严重思想障碍。近代中国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突破“夷夏大防”和传统技艺观的思想观念，这种突破具体体现在师夷和开放的认识与行动上。时局的变化使洋务官员认识到师夷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学习外国态度上，也更为理直气壮：“若（华学）尚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7] (卷15, P4)} 可见洋务官员已经对“夷夏大防”观念有了突破。对传统技艺观的突破与“夷夏大防”观念的突破是相联系的。洋务官员已经认识到泰西各国的强大在于他们重技艺，因此，他们仿西法、重西学、研究技艺、激励人才，大有“不极其精不止”^{[5] (P83)} 之势。传统教育一直将科举仕途视为正道，而派遣留学生赴美，则开了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先河，这一“创始之举”是“古来未有之事”，^{[8] (卷19, P7)} 突破了“夷夏大防”和传统技艺观，对开启风气、思想启蒙，吸纳西学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自此以后，中国出洋留学者渐多。1875—1881年，沈葆楨、李鸿章等又先后派出几批人赴法、德、美等国留学；1896年，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派送留学生，20世纪初赴日留学遂成为一种热潮。如果将选派留学生置于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大潮中去考察，那么，丁日昌对中国首批留学生赴美的伟大创举的促成，其意义就更深远。

第二，为我国培养了急需人才。为国育才，为洋务运动育才，是派遣留学生的首要目的。尽管由于国内顽固派与曾为留美学生监督、后改派为中国驻美公使的陈兰彬和继任留学生监督的吴子登等的破坏，中国留美学生100多人于光绪七年（1881年）被遣送回国，中国首次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夭折了。这些分4批到达美国的学生归国之后，“分派各处为差，均能始终勤奋，日进有功”。^{[2] (P167)} 据统计，除17

人早夭, 1 人不详外, 其余 102 人留美归国后的职业分布是: 政府官员 4 人, 铁路工程师 5 人, 医生、教师、记者、编辑 10 人, 经商、银行、海关 12 人, 煤矿工程师 13 人, 铁路官员 14 人, 外交人员 17 人, 电报工作 17 人, 海军军官 18 人(统计时略有交叉重复)。[9] 可见, 这批人绝大多数成了近代中国的有用人才, 而其中又有卓越超群, 成了中国近代史的著名人物的, 如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民国政府首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 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 中国近代很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严复等。另外, 黄耀昌、陈荣贵、唐国安、梁普照、邝荣光、邝景扬、陆锡贵等, 成了首批矿业工程师; 朱宝奎、周万鹏、袁长坤、程大业、吴焕荣等均在电线电报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幼童留学回国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 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 对广东等省的人才培养影响深远。由于世俗的偏见和传统的积习, 也由于当时“中国尚无报纸以传播新闻, 北方人民多未知中国政府有此教育计划, 故预备学校招考时, 北人应者极少”。当年首批留美学生在 4 年中分 4 批共 120 人的选派, 在偌大的中国居然很难满额, 因此广东成了生源的重要省份。因为丁日昌、容闳都是广东人, 他们在招生任务难以完成的情况下, 自然把目光放在广东或毗邻澳门的香山县, 甚至港澳地区外国人所办的学校, 从这些地方招集幼童赴美。120 名留学生, “南人十居八九”, “来者皆粤人, 粤人中又多为香山籍”。[3] (P128) 这批留学生中, 来自广东的 83 人, 江苏的 22 人, 浙江的 8 人, 安徽的 4 人, 福建的 2 人, 山东的 1 人。

如上所说, 尽管这批学生学业未完便被迫回国, 但他们经努力后仍大多数学有所成, 并且因为这批人开风气之先, 其对家乡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这应该是近代广东人出国求学多、人才多乃至观念较新的一个重要原因。清末民初, 广东、江浙人士在中国政治、外交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 大概与此均有较大关系。[10]

参考文献:

- [1] 张之洞. 劝学篇: 游学第二[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 [2] 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A]. 洋务运动: 二[Z].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 [3]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 [4] 吕实强. 丁日昌与自强运动[J].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 1972.
- [5] 福建巡抚王凯泰奏[A]. 洋务运动: 一[Z].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 [6] 印鸾章. 清鉴: 卷 15[M]. 上海: 世界书局, 1936.
- [7] 吴汝纶. 李文忠公全集: 朋僚函稿[A].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 695[Z]. 台湾: 文海出版社, 1983.
- [8] 吴汝纶. 李文忠公全集: 奏稿[A].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 691[Z]. 台湾: 文海出版社, 1983.
- [9] 黄继宗, 于醒民. 洋务运动中留学生的派遣[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81, (4).
- [10] 郑智勇. 丁日昌与中国首批留学生赴美[J]. 汕头大学学报, 2003, (1).

[责任编辑 阎现章]

On Ding Richang's Function in the First Children Studying Abroad in Late Qing Dynasty

GAO Ru-min

(Department of United Front,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Ding Richang actively took part in the education of studying abroad and carefully plot in some specific affairs. It is clear that without Ding Richang's understanding, supporting and promoting Rong Hong's plan for the education of studying abroad can't be adopted by Zeng Guofan and Li Hongzhang, not to mention be sanctioned by Qing government.

Key words: Ding Richang;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the education of studying abroad